



马克思主义 当代 (2011)

◎离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抽象的，从而也是无法指引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本身正是在中国化的进程中与时俱进地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理论形态。

主 编 万 斌

副主编 马建青 张继昌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万 斌 主 编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011)
马建青 张继昌 副主编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011 / 万斌主编.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3
ISBN 978-7-308-09662-1
I. ①马… II. ①万… III. ①马克思主义—发展—研
究—中国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26125 号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2011)

万 斌 主编
马建青 张继昌 副主编

责任编辑 李海燕
封面设计 续设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丰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328 千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9662-1
定 价 4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0571)88925591

目 录

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研究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思维必然性	万 磊 张应杭/003
论早期共产党人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贡献	张继昌/009
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说起	
——浅议邓小平理论形成的主观条件	宇正香/022
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及当代价值	刘亚培/027
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视阈下中国独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历史	
必然性	秦 鼎/036
试论列宁斯大林对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理论探索	石 然/045
浅析“苏联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路径	谢春萌/054
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基本经验	张国宏/060
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探析	闫艳红/071

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方法研究

建设高职德育工作长效机制之实践与探索	陈国锋/079
雅斯贝尔斯教育思想对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洪 光/086
试析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根源问题及实施路径	高文苗/093
论谈话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	
——以浙江大学外语学院“一对一”谈话制度为例	祝秀香/099
后现代主义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刍议	王平平/105
新媒体技术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三位一体”的角色分析	李 静/112
思想政治理论课呼唤“美”	余建云/118
浅析转变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观的必要性	张大汇/126

论大学生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融合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傅文轩/135
论大学生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闫秀丽/142
论明星行为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作用	范妮妮/151
浅论“琴棋书画”对促进心理健康的作用	文 震/158

热点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

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丽水生态文明建设	朱晓虹/167
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看生活服务类报刊娱乐专版的发展	程 晨/171
消费主体性的丧失 ——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批判	赵恩国/181
以国民性为视阈探究中国发展道路中曲折的必然性	杨思慧/187
网上“群众路线”:新时期我党群众路线的延伸、实践和启示	高丽静/194
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肖香龙 闫万万/203

近现代史研究

中国近代民主进程发展简析	吴立云/213
近代民本思想与以人为本执政理念之契合	黄延峰/221
浅析“三三制”政权对当今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借鉴意义	刘 琼/227
论茅以升的工程伦理思想 ——以钱塘江大桥为例	徐炎章 宋 玮/235

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研究

孟子理想人格说及其对大学生人格塑造的意义	项 珍/245
浅析《道德经》德育原则和目标	刘文成/256

教学研究

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专题型教学模式的构建	王晓炜 颜桂珍/265
高校思想政治课情境教学的探索	骆 笑/273
后 记	/282

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 中国化研究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命题的思维必然性

万斌 张应杭

【摘要】从抽象到具体是人类思维发展的一个普遍规律。中国共产党人在把握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时也遵循着这样一个思维发展的规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中，“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是思维抽象的结果，“中国化”是思维具体对中国国情及民族性的整合。离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抽象的，从而也是无法指引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本身正是在中国化的进程中与时俱进地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理论形态。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思维规律 与时俱进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核心理念。尽管许多学者坚信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念在当今已经是一个基本的共识。^①但是，如果我们放眼全球却可以发现，无论是来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还是来自西方理论界一直有一种质疑的声音。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以“中国化”（“本土化”、“民族化”）来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普世性和当代性。这显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②

^① 龚育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问题[M]. 新华文摘, 2005(12), 1.

^② 庞龙. 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九个挑战性观点[M]. 河北学刊, 2009(2), 27.

对于这样的质疑,我们显然不可能置之不理。事实上,当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已经做了诸多的回应,他们在论文与著述中表达的许多观点也是相当精辟得当的。^①但是,从现有的文献检索来看,似乎尚没有从思维逻辑的必然性为视阈来探讨这一问题的。正是有鉴于此,本文作者拟通过学理的阐述来论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逻辑思维必然性。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体现的是 思维中的具体普遍性

如果从人类思维的逻辑进程来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我们就可以发现: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原理从抽象到具体的智慧提升过程。

众所周知,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曾经出现过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偏差。它严重危害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事业。如果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中国后曾经出现的教条主义做些理论剖析就可以看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内部的教条主义者,其错误的思维根源固然在于主观和客观的相分离,在于主观脱离客观、脱离实际、不了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情况。但这仅是教条主义错误一般的认识根源。深入地考察就可以发现,教条主义者除了一般的共性(即主观脱离客观)外,还有其独特的思维根源。这个错误的思维根源就在于教条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认识和把握只达到“抽象普遍性”的认识层次。在这种抽象普遍性的认识层次上,普遍就是普遍,它排斥一切个别和特殊,因此这种普遍性必然与特殊性是绝对地对立着的。正是在这种抽象普遍性的知性思维(即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中,教条主义者必然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作为绝对真理,生搬硬套用以裁剪包容诸多特殊性的客观现实。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王明可谓是这一形而上学思维典型。他认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是错误的。这样提出问题,本身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的马克思主义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马克思主义现在只能是,将来也永远只能是国际主义学说。”^②

其实,对抽象普遍性这种思维方式,黑格尔的批判是相当深刻的。在黑格尔

^① 胡国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与反思[M].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08(6),5.

^② 王明.中共五十年[J].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17.

看来，“与特殊性坚持地对立着的是抽象普遍性”^①。这种普遍性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在知性思维阶段中把握的普遍性，而真正的普遍性“贯穿于一切特殊性之内，包括一切特殊性于其中”^②。黑格尔称这是一种具体普遍性。列宁对黑格尔这样一个两种普遍性区分的思想极为赞赏。他在《哲学笔记》里情不自禁地写道：“绝妙的公式：不只是抽象的普遍性，而且是自身体现着特殊、个别、个别东西的丰富性的这种普遍性（特殊的和个别东西的全部丰富性！）！！好极了！”^③教条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原理这一普遍真理的认识，无疑只达到抽象普遍性的层次，因而他们在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时，必然地要与各国的具体国情这一特殊性相分离。

其实，从抽象到具体，正如马克思早已指出的那样，这是人类思维发展的一个普遍规律。因此，我们的思维在把握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时也遵循着这样一个思维发展的规律。当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认识尚处于知性思维阶段时，只形成一种抽象普遍性的概念。在这个认知阶段，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是与各国特殊国情绝对地对立着的。这个思维结果，正如黑格尔分析的那样，作为对普遍性认识的一个环节有其合理的意义。但其合理性仅此而已。思维一旦在这个环节凝固和停滞，那么，这种不包含特殊性的普遍性是无法用以指导实践的。我们很难想象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离开了各国具体国情是怎么样的。因此，思维必须由抽象上升为具体，亦即由抽象普遍性上升为具体普遍性。

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普遍原理之所以能够清醒地坚持中国国情，正表明了他们在思维方式上的卓越智慧。否则，毛泽东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就无从谈起。这就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④同样的道理，没有抽象普遍性上升为具体普遍性的辩证思维，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

① 黑格尔. 小逻辑[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78.

② 黑格尔. 小逻辑[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351.

③ 列宁. 哲学笔记[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8.

④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6.

路也不可能被认同。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就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①此后，邓小平的全部精力几乎都在思考和实践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问题，并引领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探索出了一条让世界为之瞩目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重要性恰恰就体现着这样的一种由抽象上升为具体的必然性。在这里，中国化作为特殊性的因子，它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所必须包含于其中的。换句话说就是，各民族的特殊性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是内在统一的。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才有可能用以指导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

三、从抽象走向具体是马克思主义 与时俱进必须经历的逻辑路径

马克思说过：“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统一，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②对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之普遍性的把握，我们同样必须从这样一个多样性的统一，即包含了丰富特殊性的统一中去理解。也就是说，从思维范式上，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理解为是一种包含了民族性这一特殊性在内的具体普遍性。因此，各国共产党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从理论和方法上概括，就必然地要坚持如下两方面的原则：

第一，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作为一种具体普遍性一定是在与各国的民族性这一特殊性的相互联系中揭示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正是这一具体普遍性的思维要求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除了深刻地揭示社会发展的普遍一般规律外，还必然要对各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国情给予充分的关注。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创始人对此曾有过极多的论述，恩格斯就曾这样说过：“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③列宁更是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因而他特别指出：必须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作为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来理解。从一定意义上说，列宁正是在思维方式上恪守对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这一具体普遍性思想，才能把这个伟大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50.

学说正确地运用于指导俄国革命的实践，从而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作为一种具体普遍性，它也一定是在与各国的民族性这一特殊性的发展中揭示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这亦即是说，各国各民族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在不断发展中展示在各国共产党人的面前的。如果我们在这其中对新情况、新问题没有及时而恰当地分析和研究，而仅仅只是如列宁批评的那样“根据书本来争论社会主义的纲领”，那么，我们就已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了。所以，恩格斯在谈到我们应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时，要这样强调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①

因此，从民族和国情的特殊性出发，注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从理论上说，它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一条重要途径；从实践上说，它提醒各国共产党人必须探寻出一条适合本民族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只有这样，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认识上，我们才可以说我们已经从具体普遍性的辩证思维高度理解和把握了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也就在这样一个包含着民族性之特殊性在其中的过程中不断实现着自己的现代性。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我们看到的正是这样一个从抽象走向具体的思维路径。马克思主义恰恰就在这样一个与各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的过程中与时俱进，保持着自己非凡的理论生命力。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是在这个发展中享有崇高的历史地位的。俄国远东研究所副所长波尔加科夫在《邓小平与中国改革政策》一书中曾经这样评论说：“每个仔细的读者都会发现，邓小平和毛泽东的观点有一定的相似性。这明显表现在他们对待外国经验的态度上，表现在他们对中国民族特点的说明和对中国发展成为‘强大社会主义国家’期限的预言上。”^②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创立 160 多年以来，特别是 20 世纪以来，它的发展过程从总体上看就是一个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统一的进程。由于马克思主义集中地反映了时代的本质特点，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很快超越了其创立时期的狭隘地域和民族界限，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在 20 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过程中，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者和共产党人纷纷把马克思主义和本民族、本国家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60.

^② 齐欣等编译. 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623.

实相结合,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不断地民族化,出现了苏俄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以及现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等形态。

我们可以断言,20世纪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过程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更为深刻的世界化过程,它以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前提,但比马克思主义的那种单纯的传播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因为它使马克思主义真正在世界上的一些民族中生根、开花和结果,并因此深刻改变了这些民族乃至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刻意义和世界性的价值正是在这样一个语境中得以凸显的。

四、结 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有思维逻辑的必然性,而且也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基本事实来印证。因此,那种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以“中国化”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异端论”质疑是站不住脚的。

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过程中,许多有创新性的理论观点都曾经被视作“异端”。譬如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和中国革命主力军是农民的思想,邓小平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江泽民关于共产党要坚持“三个代表”和社会新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可以入党思想等等,都曾经被所谓的一些正统理论家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①邓小平在谈到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的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也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成是‘异端’。”^②可见,如果没有依据国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创造性的理解及创造性的运用,那么马克思主义恰恰就会失去其指导意义。

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无惧“异端”的责难,以勇于实践的魄力和胆识,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间和空间维度推向更高更远,从而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留下辉煌绚丽的一笔。

【作者简介】 万 斌 浙江大学思想政治教学科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应杭 浙江大学思想政治教学科研部教授
浙江 杭州 310028

^① 李君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若干问题研究[M].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2),10.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0.

论早期共产党人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贡献

张继昌

【摘要】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基本理论，同时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做出了最大的贡献，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但是，在民主革命发生初期，早期共产党人曾经对新民主主义理论进行过有益的探索，问题涉及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方方面面。本文从革命性质、革命任务、革命对象、革命动力、革命前途、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相互关系、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诸方面，对包括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瞿秋白、刘少奇等在内的早期共产党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进行了梳理，阐明了他们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所作的贡献。

【关键词】 早期共产党人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贡献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实现第一次结合的重要理论成果，同时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在创立这一理论的过程中，毛泽东无疑是作出了最大的贡献，是这一理论的集大成者。这一理论的系统阐述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但是作为一个集体智慧的结晶，早期共产党人对这一理论的形成曾经作出过重要的贡献。所谓早期共产党人，主要是指建党初期的共产党人，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刘少奇等一批共产党人。

新民主主义理论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新民主主义建设理论。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主要是包括了革命性质、革命任务、革命对象、革命动力、革命

领导权、革命前途、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相互关系、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相互关系、革命的总路线等一系列理论问题。所谓新民主主义建设理论，主要是关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对于早期共产党人来说，他们直接面对或者说遇到的还只是一个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何革命的问题，因此他们所能回答的问题，也只能是直接面对和遇到的问题。他们的贡献也主要局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方面。

一、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问题

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对象问题，是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革命性质决定了革命的任务和对象，革命的任务和对象又体现着革命的性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面临的任务主要还是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促成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促成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所以，直到中共“一大”召开，中国现阶段革命性质、任务和对象问题也还未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但是，中国革命性质、任务和对象问题，又是早期共产党人不能不面对的问题。此后，随着中共“二大”的召开，这个问题就明确提出来了。中共“二大”制定的最近奋斗目标，即最低纲领明确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一场“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革命的任务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

同一时期，早期共产党人也开始了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对象问题的探索。中共“二大”结束后不久，蔡和森在《统一，借债，与国民党》一文中说，现实中国的政治，内部全部政权还在北洋军阀手里。国际上早已处于半殖民地，华盛顿会议后，更是把他活活地放在英、美、日、法帝国主义协同侵略的“门户开放”政策之下，帝国主义决不会容许中国自成为工业生产大国，成为政治上自由发展与完全独立。中国要实现独立自强，只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在国际上与俄罗斯和已解除武装的德意志结成经济联盟；另一种就是在国内“努力完成民主革命，推翻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之特权与压迫，建立完全自主的独立国家”^①。

1923年4月，党的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在《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说：“观察过去及现在的革命运动，确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且我们也应该希望他能成功——实实在在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②

1926年4月，瞿秋白在《北京屠杀与国民革命之前途》一文中说：“这一革命

^① 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99.

^②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20.

是资产阶级的革命……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一革命的主要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①

另外,还有一些早期共产党人,他们更多的是使用国民革命这一概念,而不是使用资产阶级革命这一概念。但众所周知,在当时的条件下,国民革命即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任务是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军阀。

建党初期,早期共产党人虽然认识到了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任务是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军阀,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但却没有认清这种革命同以往的旧民主主义的区别,他们的认识基本上还是停留在旧民主主义的历史阶段。如中共“二大”宣言所说:“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大革命时期,党的一些领导人如陈独秀等,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已经超出了旧民主主义的范畴,带有鲜明的新民主主义的色彩。1927年4月6日,此时大革命尚未失败,陈独秀在答沈宾祈、朱近赤关于国民革命的归趋时说:“中国国民革命之性质,是世界资本主义将近崩溃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资本主义之各被压迫阶级的民族、民权、民生革命,而不是世界资本主义初兴时代之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因为革命的世界环境不同,革命的国内社会势力不同。”^②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同于资本主义初兴时代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为世界的不同,革命的国内社会势力不同,所有这些不同的却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旧的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同。但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还缺一个领导阶级的不同。正是由于领导阶级的根本不同,成为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显著区别。但陈独秀的认识也到此止步。因为此前,陈独秀已经产生了“二次革命论”的思想。

还有一些共产党人,如蔡和森、瞿秋白、邓中夏,虽然他们在建党初期已经认识到了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必须要由无产阶级来领导,但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也未能明确指出,这种民主革命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总体说来,早期共产党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对革命性质、对象和任务的认识基本上是正确的。但限于历史条件,都还没有意识到这种革命是一种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和反封建军阀,在乡村则是要消灭封建剥削关系,完成土地革命。

^① 瞿秋白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88:39.

^② 陈独秀文章选编(下). 三联书店,1984:409.

二、关于中国革命的动力

革命动力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如何组织队伍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一大”的时候，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一大”党纲只是表示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以社会革命政策为自己的主要目的。至于其他政党和团体则表示彻底断绝与资产阶级的黄色知识分子及与其类似的其他党派的任何联系。但是，在党的“二大”上，党就已经明确了党为工人和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应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此后，又积极同中国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国民党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

在同一时期，甚至更早一个时候，一些共产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也开始从阶级分析的方法入手，探索如何组织队伍的问题。

1919年2月，即在五四运动发生之前，李大钊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就强调说：“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①因此，他要求知识青年，“要去开发他们，使他们知道要求解放。”^②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建立之后，李大钊在谈到土地和农民问题时说：“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③

中共“三大”确定了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之后，陈独秀就国民革命的动力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中，他虽然总体上坚持认为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各阶级还都紧紧束缚在宗法社会的旧壳里，甚至认为多数工人还很幼稚，农民散漫、保守、文化低，但仍然认为，“中国的工人阶级，在目前环境的需要上，在目前自身力量的可能上，都必须参加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④“农民占中国全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⑤

此后，在1925年初，陈独秀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工人的力量》一文中，更是明确指出：中国工人阶级是新生产力的代表，是一个不妥协的革命阶级，“中国

① 李大钊选集. 人民出版社, 1993:146.

② 李大钊选集. 人民出版社, 1993:145.

③ 李大钊选集. 人民出版社, 1993:535.

④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1979:33.

⑤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1979:31.